

中華郵政特准掛號立券認爲新聞紙類

引言

犬養被刺與日本政局前途

憲政問題

上海戰事的結束

參加國難會議之回顧

日本人如何取得鐵礦砂的供給

中國的包工制

丁文江

胡適

適之

蔣廷黻

翁文灝

湛然

(重校再版)

獨立評論

第一號

中華民國十一年二月六日
再版
第四版

獨立評論每

週星期日出

版

每期定價四分

預定全年共五

十期，連郵費

一元六角，半

年九角，國外

加郵費一元六

角郵票九五折

社址：北平

後門慈慧殿北牙胡同二號

寄售及代定處

北平

天津

上海

南京

西安

蘭州

武昌

開封

北平圖書館

琉璃廠文齋

青雲閣中書

西單商場(代定)

新市場(代定)

東安市場(代定)

各大學書處

南開大學(代定)

天津路(代定)

五馬路(代定)

四馬路(代定)

四馬路(代定)

時代公報社

中央書局

西安書報社

甘肅書報社

新生書報社

華新書報社

安徽省立圖書館

引言

我們八九個朋友在這幾個月之中，常常聚會討論國家和社會的問題，有時候辯論很激烈，有時候議論居然頗一致。我們都不期望有完全一致的主張，只期望各人都根據自己的知識，用公平的態度，來研究中國當前的問題。所以儘管有激烈的辯爭，我們總覺得這種討論是有益的。我們現在發起這個刊物，想把我們幾個人的意見隨時公布出來，做一種引子，引起社會上的注意和討論。我們對讀者的期望，和我們對自己的期望一樣：也不希望得着一致的同情，只希望得着一些公心的，根據事實的批評和討論。

我們叫這刊物做「獨立評論」，因為我們都希望永遠保持一點獨立的精神。不倚傍任何黨派，不迷信任何成見，用負責任的言論來發表我們各人思考的結果：這是獨立的精神。

我們幾個人的知識見解是很有限的，我們的判斷主張是難免錯誤的。我們很誠懇的請求社會的批評，並且歡迎各方面的投稿。

犬養被刺與日本政局的前途

丁文江

本月十五日犬養毅在日本首相官邸被刺，不但日本的政治完全露骨的恐怖化，而且從此以後，恐怕日本的政黨內閣與立憲政治要根本動搖了。

在凶手沒有審訊以前，我們原不能斷定主凶的背影，但是暴動的人都是着海陸軍的制服，可見行凶的人都是軍人。自從一九二九年民政黨組閣以來，因為世界經濟恐慌，失業的日多，青年的軍人，對於政黨政治已經明目張膽的攻擊。最初藉口民政黨對中國外交軟化，攻擊政府。於是濱口遂被暗殺。若槻內閣時代，井上大藏大臣繼續實行他的緊縮政策，海陸軍都受影響，軍人怨恨更深。但是常日民政黨的要人，比較的清廉，所以社會上對於軍人的舉動，還有相當的反對。等到去年九月東三省事變起來，軍人的主張完全勝利；一方面中國不能抵抗，一方面美國和國聯並沒有干涉的舉動，于是日本大多數的青年，都贊成軍閥，厭惡政黨。軍人專政和法西斯蒂主義，漸漸得到日本社會的同情。

去年十二月政友會組閣，重新選舉的結果，政友會在議會佔有絕對的多數：四百四十六個名額，政友會佔有三

百餘名之多。但是政友會內部極其複雜：犬養毅的死黨，不過二十多人；此外有鈴木系，久原系，床次系，舊政友系和中立派。因為各系不能相下，而中立派擁護犬養，所以犬養可以組閣，而實際上對於黨的統治指揮，都談不到。本年三月因為內務大臣的更選，黨內幾乎發生破裂。其後經床次調解，方暫時告一段落。但是黨內意見極不一致，一切政策都不能實行。

政友會的大敵不是民政黨，而是軍人。軍人是主張根本不承認國聯，對中國澈底用兵的。文治派的政客對於世界大勢比較的明瞭，不能完全服從軍人的意旨，于是軍人把從前厭惡民政黨的心理，一轉移到政友會的身上。政友會抵抗軍閥的能力，還不如從前的民政黨，因為從前民政黨的首領，如濱口，如井上，都有清廉之名，受社會上相當的敬仰。政友會的歷史，污點甚多：除去犬養，高橋幾個人以外，許多人都行賄營私的嫌疑，為社會所指摘。因此軍人攻擊他們，更可以得國民的同情。

軍人與政友會公開的衝突，第一次是更換南滿鐵道總裁的問題。南滿鐵道總裁是著名的肥缺，向來都是黨出身

的政客去做。民政黨的內閣任用不是黨員的內田康哉做總裁，頗得一般人的稱許。犬養內閣不敢公然撤換內田，于是先逼江口副總裁辭職，使內田不安于位。但是內田的輿論很好，許多人不贊成政友會的舉動。軍閥遂乘機反對，說當外交重要的時候，政府不應該只顧黨的利害。犬養沒法，只好慰留內田留住。政友會內閣的威信遂從此掃地。

同時對國聯的態度，對中國的外交，軍人同政黨的意見日見衝突。三月十四日荒木陸軍大臣在新聞紙發表意見，說日本應該採取獨立外交政策，建立東亞的門羅主義，不准英美干涉遠東的政治。但是政黨只知道爭政權，專門的外交官只知道追隨英美：所以在政黨內閣之下，決不能實行這種外交。

五月六日日本的報紙忽然宣傳一種很可驚異的新聞。內容的大概說，目前日本內憂外患非有强有力的政府不可。政友會雖在新議會有多數，而內部分裂，政策不定，不能擔當重任。樞密院副院長平沼騏男承受荒木的意旨，得內閣官書記長森格的同意，向各方面活動，預備于本月臨時議會開會的時候，推翻政友會內閣，另行組織軍人的法西斯蒂內閣。

這種消息的確實，大概是毫無問題。因為五月八日政友會關東大會在橫濱公園開會，犬養毅演說，就公開的討論這個問題。他說：「近來一部分人有否認議會的傾向，以為議會距政治實際迂遠，不能改善。我們相信議會政治的妙用有十分改善的可能。政界百弊的根源是因為選舉要莫大的金錢，所以先不可不改正現行選舉法。改正了制度，然後政治家能活用牠。：我們相信可以把否認現行政治制度的極左傾和極右傾的大部分緩和同化。」

這段演說，就變了犬養毅的催命符！

不論何人來繼犬養組閣，軍人的法西斯蒂運動不久一定要成功的。政友會的勢力以鈴木為最大，然而各系聯合起來反對他，鈴木也無法統治。最可注意的是與鈴木接近的森格也加入了法西斯蒂運動。以目前情勢而論，政友會或者要擁戴高橋大藏大臣，來和緩各派。但是此事縱然成功，也不過短期的過渡。因為不但政友會內部不團結，民政黨自從井上被刺以後也毫無生氣，都不能抵抗；而且軍人的主張，大得社會的歡迎。我們只要看全民社分裂以後，一部分人出來組織國民社會黨，就可以知道日本政治的真正趨向了。

軍人的主張是：否認國聯，排斥英美在遠東的勢力，

建立東亞門羅主義，對中國澈底的強硬。現在這種主張不久要具體化了。可憐我們國內的統治者還是四分五裂，還要借外交問題來爭政權！ 一九三二，五，十六。

憲政問題

最近幾個月之中，憲政的運動頗有進展。國難會議開會之前，多數非國民黨的會員都表示贊成早日結束訓政，實行憲政。政府與國民黨的領袖對於這一點頗多疑慮，所以把「內政」一類問題不列入國難會議討論範圍之內。許多會員因此不願意赴會。然而國難會議開會時，居然也有一個「內政改革案」的產生與通過，決定於本年十月十日以前成立國民代表大會，由各大都市職業團體及各省區地方人民選出代表三百人以上組成之。

不久政府依據去年十二月底國民黨四中全會的決議案，通過了市參議會與縣參議會的組織法。

住在上海的孫科先生於四月二十四日發表他的抗日救國綱領，其中主要的主張是（一）於本年十月由立法院起草憲法草案；（二）明年四月召開國民代表大會，議決憲法，決定頒布日期；（三）全國人民在不危害中華民國不違反三民主義之原則下，皆得自由組織政治團體，參加政

附註：此文寫成後，報載犬養毅已於五月十六晨因傷重死了，高橋藏相已奉命代理首相，陸相與海相皆引咎辭職。軍人有反對政黨內閣之說。（編者）

胡適

治；（四）於本年十月召集各省省民代表會。

此外還有民選立法院和監察院委員各半數的辦法，聽說政府擬有草案，正在審查中了。孫科先生則主立法和監察兩院的委員都由國民代表大會選舉。

住在香港的胡漢民先生近來也屢次發表談話，表示他贊成憲政的實行。並且贊成黨外可以有黨了。

○ ○ ○

我們考察這些主張，可以說，這些主張無論內容有多大的出入，都可以表示憲政運動的開始進展。其中最大的異點，約有這些：

第一，政府派不主張縮短訓政年限，要到民國二十四年才算訓政結束；而在野派（包括暫時在野的孫科先生們）則主張提早憲政的開始。其實這一點不成多大問題。如果在這兩年半之中，政府和人民都能積極準備憲政的施行，如果訓政的目的是（如汪精衛先生去年十二月十日說的

（『在訓練民衆行使政權』——那麼，兩年半的光陰也許是值得的。如果訓政的延長只是爲了保持政治飯碗，畏懼人民參政，執政權而不能做點治國利民的事業，號稱訓政而所行所爲都不足爲訓，——那麼，訓政多延一日只是爲當國的政黨多造一日的罪孽而已。

第二，政府派（包括國難會議中通過提出政治改革案的先生們）雖然勉強承認民意機關的必要，而處處縮小民意機關的權限。如國難會議原案的國民代表大會，只有議決預算決算，國債，重要國際條約的三項職權。反之，在野派如孫科先生則主張國民代表大會有很大的權限，爲「代表中華民國國民統治國家之最高權力機關，不受解散及任何之干涉」。這一點是值得討論的。晉國難會議原案辯護的梅思平先生（在時代公論第六號）說：『我們從過去北京時代國會的經驗看起來，知道在初行民治的國家，議會的權力越大，他的腐化也越容易。』歷史是可以有種種看法的。我們研究民國初年國會的歷史，也可以說：在初行民治的國家，如果解散國會之權在行政首領手裏，議會政治是不够制裁那反民治的惡勢力的。梅思平先生指出『質問，查辦，彈劾諸權，都變成敲竹槓的利器；官吏任命的同意權，簡直是納賄的好機會。』梅先生何不進一步說

：預算決算和國債的議決權更是敲竹槓和納賄的好機會？敲財政部的竹槓，豈不更肥？如此說來，還是爽性不要議會爲妙！

○ ○ ○

奇怪，在這個憲政問題開始進展的時候，悲觀的論調早已起來了。在時代公論第六號，我們得讀何浩若先生的『不關重要的國民代表會』一文，根本懷疑民主政治的功用。他的結論是：

民主政治便是資產階級的政治，便是保護有產階級而壓迫貧苦民衆的政治。……

建國首要在民生；舍民生而談民主，便是舍本求末。

在國聞週報第九卷十八期上，我們得讀季廉先生的『憲政能救中國？』一文，也是根本懷疑憲政的，他說，實行憲政必須具備三個條件：（一）教育進步，（二）交通發達，（三）政風良好。因爲中國沒有這三個條件，憲政是無望的。況且憲政論的根本立場就不甚健全，因爲

第一，從理論上言，議會政治是資本主義的產物，現在資本主義早踏上沒落的階段，議會政治更破綻畢露了。

第二，從事實上言，英美的民主政治並不足取法。

第三，從中國需要上言，憲政不能解決目前困難如「土皇帝」及共產黨等等。

第四，爲立國久遠計，我們不應拾資本主義的唾餘

，我們應該採用「社會主義的政治制度」。

這種議論都不是在短評裏所能討論的。我們只想在這裏提出幾個問題，作這種討論的引子：

第一，我們要明白憲政和議會政治都只是政治制度的一種方式，不是資產階級所能專有，也不是專爲資本主義而設的。在歷史的過程上，議會政治確曾作過中產階級向獨裁君主作戰的武器，但現今各國的普遍選舉權實行後，也會屢次有工黨代表因議會政治而得掌握政權。近百年來所有保障農工和制裁資產階級的種種「社會立法」，也都從議會裏產生出來。一種政治制度就好比一輛汽車，全靠誰來駕駛，也全靠爲什麼目的來駕駛。我們不因爲汽車是資本主義的產物而就不用汽車，也不應該用「議會政治是資本主義的產物」一類的話來抹煞議會政治。

第二，議會政治與憲政不是反對「民生」的東西，也不是和季廉先生所謂「社會主義的政治制度」不相容的東西。「社會主義的政治制度」難道只有無產階級專政的一

種方式？如果只有這一種方式，那麼，不信中國可行憲政的先生們，難道以爲中國已具備無產階級專政的種種條件了嗎？

第三，我們不信「憲政能救中國」，但我們深信憲政是引中國政治上軌道的一個較好的方法。憲政論無甚玄秘，只是政治必須依據法律，和政府對於人民應負責任，兩個原則而已。議會政治只是人民舉代表來辦政治的制度而已。今日之土皇帝固然難制裁，但黨不能制裁土皇帝，政府不能制裁土皇帝，我們何妨試試人民代表的制裁能力呢？當倪嗣冲馬聯甲盤踞安徽的時代，一個很腐敗的省議會，居然能反抗鹽斤加價，居然能使安徽全省人民不增加一個錢的負擔。現在堂堂黨國之下，有誰能制裁我們的綏靖主任呢！季廉先生舉出最近一月二十日何應欽部長提議削減各軍經費，二十二日便有各軍駐京七十二軍事機關代表齊赴軍部請願，要求維持原案。季廉先生何不想想，那七十二個軍事機關都有駐京代表在那裏替他們七十二位土皇帝爭權利，我們四萬五千萬的老百姓受了無窮的冤屈，不應該請幾位國民代表去說說話，伸伸冤嗎？難道我們應該袖手坐待季廉先生說的「那應運而生的政治集團」起來，才有救星嗎？

一九三二，五，十六

上海戰事的結束

適之

上海停戰協定已於五月五日簽字了。協定的全文凡五條，附文三件，都已見五月六日的各報。協定中最不滿人意的的是沒有明文規定日軍撤退的期限。在完全撤退以前，日軍仍可暫駐和公共租界及虹口越界築路毗連的區域。日軍的撤退已在五月六日開始了。

日軍撤退期限的問題曾引起最久的爭執，停戰會議幾乎因此破裂。國際聯盟特別委員會的草案本主張：由關係各國合組混合委員會，得用大多數的表決，規定日軍撤退的時期。但這一條最受日本反對，後來由英國公使藍博森提出調和辦法，根據停戰協定附件三所規定，混合委員會對於締約國之一方忘於履行協定第一二三條時，有喚起注意之權。這就否認混合委員會有規定日軍撤退之權。

撤兵期限的問題，以國聯十九國特別委員會的壓迫，終不能得日本的承認。所以此次協定第二條只規定「日本軍隊撤退至一月二十八日以前狀態」的原則，而沒有撤退日期的確定。

此次的協定本是一種「城下之盟」，我們對他本來就不存多大的奢望，所以我們對於這次簽定的條文雖然不能

滿意，也不願苛責當局的諸人。平心而論，此次協定的結果，確定了日本撤兵的原則，收回了日軍佔據的各地，拒絕了那盛傳一時的「中立市」的野心企圖，確定了撤退區域內中國警察維持治安的主權：這都不能不請是中國停戰代表失敗之中的成功。

我們忍痛回想，自一月二十八日以來，我國死傷了幾千個愛國健兒，損失了幾十萬萬元的財產，結果只換得了這樣的一紙城下之盟約。這自然是最可痛心的事。然而我們把眼光放的遠一點，也可以在慘霧之中看見一線的光明。我們覺得，這三個月的淞滬事件至少有兩種教訓是值得我們注意的。

第一，是因這事件發見了我國民的抵抗力，增高了我民族的自信心。自九一八以來，許多愛國的人都陷入了極端的悲觀，眼見那「勇於私鬪，怯於公戰」的惡劣現狀，都幾乎不信這個民族有競爭生存的能力了。十九路軍在淞滬一帶的三十多日的血戰，用熱血和愛國心替我民族一洗無抵抗的奇恥，使敵人震驚，使全世界起敬，使中國人人感覺一種新的生命，新的希望。雖然血肉搏戰終久抵不住世

界最精的武器，然而這一個月的抵抗可算是已爲我們這個老病民族注射了一針返老還童的靈藥。自從鴉片戰爭以來，九十年中，不曾有過這樣振衰起懦的興奮劑。民族自信力的恢復，國家的振作，都可以說是在這一役建立下了精神的基礎。

第二，因這事件的外交經過，稍稍引起了政府負責任的態度。自九一八以來，政府除了迷信國聯與九國公約之外，幾乎束手無策。民衆的激昂，本是意中的事；政府應該利用激昂的民氣和國際的輿論，來爭外交上的勝利。但政府一味敷衍民衆，高唱「抵抗到底」而實無抵抗的準備，高唱「兼用外交」而實無外交的方針。天不能助那不自助之人，何況那無制裁實力的國聯？一誤再誤，直至整個的東三省丟了，政府還在高唱絕交，而不抵抗的怪論！這種不戰不和又不交涉的外交，不能不說是政府的大罪過。但自從淞滬戰事發生以來，尤其是停戰之後，政府的外交

參加國難會議的回顧

國難會議發表之初，我對牠就不抱甚大的希望，因爲我根本不信任任何會議能救國。不但不能救國——普遍的救國——就是對目前的國難有所補助也是很困難的。個人單

似乎稍稍表示一點負責任的態度。上海在全國經濟上財政上的特殊重要地位，使政府不能不急謀結束戰事，救濟工商業，恢復政府的財政來源。上海在國際商業上的特殊地位，又使有關係的各國不能不出力斡旋。停戰會議開始以來，中間有不少的波折，也有不少與論非難，但中央政府始終表示負責任的態度，極力慰留辭職的代表，明白表示中央決心負交涉結果的責任。前日上海憤激的民衆有毆辱我國代表郭泰祺君的舉動，汪精衛君爲此事正式表示『停戰會議經過情形，迭經中央及政府審核，認爲力持大體，不辱使命』。這種積極負責任的態度，可算是政府的一大進步。八個月的國難，到今日才看見這一點點肯負外交責任的表示，真叫我們不勝感慨係之了！

廿一，五，八。

附註：此文寫成之後，日本政府已宣布決定一個月之內撤完駐軍。

蔣廷黻

獨想不出辦法，而望把想不出辦法的個人集在一處就能找出辦法來——這豈不是夢想？當時有一派想利用國難會議來改造中國的政治局面，即所謂取消黨治，實行憲政，設

立聯合政府。這些提議的發生是極自然的。國難未發生以前，國人對政府久已不滿意。所謂國民黨訓政，論其成績，尙不及宣統年間滿清的預備立憲。又加上了東北三省的喪失，宜乎人民要求政治的改造。但改造能在國難時期成功嗎？改造的運動不至引起更大的糾紛而分散國人對外的力量嗎？改造成功就能於國難有所補助嗎？人民對政府的不滿是由於一黨專政的原則，還是因為國民黨的專政是不光明呢？人民對國民黨的信仰雖然不大，對在野各黨派的信仰是更大嗎？因為我心中有這些疑問，所以我覺得這般提倡政治根本改造的人過於樂觀，偏於理想；國難會議是不能這麼利用的。

同時還有一派人對於國難會議的召集過於猜疑。他們說這會議的用意不過要找人替政府『分謗』。這兩個字——『分謗』——最足表現中國人玩政治的滑頭和卑鄙。『謗』也要看是什麼樣的『謗』。避謗不能作為有血氣的人的人生哲學。如果政府是在那裏竭力的去幹，在這時這地這種狀況之下，政府只能幹到這種地步，而人民不能諒解，偏偏要與政府爲難，那末，這樣的謗分擔一點，是義不容辭的。萬一政府是有心誤國或賣國，那末，謗有應得，會員應羣起而攻之。照我看來，「分謗」二字是不應出世的。

。會議之應否召集；既召集了，會員是否赴會，都不應該與分謗不分謗有關係。這種滑頭心理不改命，中國會教我們滑亡了！

憑良心說，國民政府雖不好，日本佔據東三省不是因此而起的。再憑良心說，政府雖不好，政府人員的平均道德和知識也不在野人士平均道德和知識之下。政府爲政府計，能對外得一勝利，牠的權威也就加高了。政府苦於沒有辦法，而其所以沒有辦法因爲力量不够：所謂心有餘而力不足。增加政府的力量；最低限度，爲政府壯膽：這是國難會議可有的使命。政府所聘的會員既然很難——其實不但各黨派，各地方，各職業，甚至各時代都有代表——會議更能完成這個使命。對外的目的大致國人的意見是一致的。政府的政策，在這個當兒，也沒有多大的選擇。保存國家領土和行政的完整這是絲毫不可減少的最低限度。與日本和而能達此目的當然是和；不能呢，當然是戰。戰而敗，敗而亡——這樣的亡國是遠勝於不抵抗而亡的。在這個立場上，政府和會議是容易得諒解的。有了這個諒解，會議可以對政府說：「這樣的，你只管努力作去。我們可擔保你無後顧之憂。有政客想與你搗亂的，我們羣起來制止；有軍界野心家想趁機來爭地盤的，我們至少使他

爲全國人民所共棄。到了對外戰爭開始以後，在軍事有關各方面，我們無不盡力幫助你。你——政府——只要瞻前；我們來顧後。」政府得了那個表示，牠的負擔就可減輕多少。同時日本人西洋人也知道了中國雖然不統一，不是日本人所說的「現代式的國家」，至少對日本、對東北問題，中國人不分黨派階級是一致的，且是有決心的。我對國難會議雖不抱很大的希望，這個精神作用的希望我曾有過的。

不幸，事與願違。開會以前，枝節橫生。我的理想的國難會議也無從實現了。直到現在，我還覺得倘在開會以前的四個月，無黨派色彩的領袖肯出力壓制黨派的競爭，這個理想未嘗無實現的可能。一般人的感想根本討厭在此時期鬧黨。至於憲法呢，二十年前也與中國人民行過結婚禮，渡過短期的蜜月，可是不久夫婦不和就離婚了。我不覺得中國人民對舊婦有一點回想之心。在這種空氣之下，有領袖肯出來以停止黨爭一致對外來號召天下是容易成功的。失敗之咎不能不歸之於在野的無政黨色彩的領袖。以後我的赴會不過把會議當作一種政治標本可供研究者的剖解。

到會的人士，國民黨員，尤其是左派的居多數。此外

有幾個毫無所爲的人如我自己的。民國元二年的議員也有幾個，這些可說是中國初期革命的產物。國民黨左派的會員可說是近年革命的產物。論議會規則的熟習，口才，普通知識，舊革命家遠不如新革命家！會議的組織——主席團，審查委員會等——給了许多節省時間的便宜。國民黨似乎已經練熟了這種開會的專門技藝。或者這就是我們中國二十年革命在政治訓練上的貢獻。

主要的議案當然是設立民意機關案。其主旨是：訓政時期不縮短——其實也只有兩年了——；在未行憲政以前，由人民選舉國民代表會議。會員約三百人，大都市佔一半左右。其職權有二：監督財政及審查條約。可注意的，這個國民代表會議的選舉法不承認一人一票的基本民治原則。十九世紀中葉的自由主義者和平等主義者請提出抗議罷！更可注意的是提案人——梅思平先生——在大會的演說詞，他不主張即時立憲，但主張設立這個「民意機關」，因爲——這是他說的話——憲法不是人造的，是生長的；曹錕的憲法美則美矣，因無歷史的背景所以未曾生效。我聽了這段演說覺得我們的政治知識實大進步了。可惜民國初年在南京製憲法的時候，梅先生未在場！可惜孫中山先生最初立志革命的時候，梅先生的政治哲學尚未出世！

可惜梅先生不澈底，因為兩年的民意機關實不能供給憲政那必須的歷史背景！

政府對國難會議的態度全不一致，連行政院本身就不一致，外交部，軍政部，財政部，倘以牠們對會議的報告為標準，顯然是無誠意的。汪精衛先生則又當別論。他的

人品和演說就是誠懇的象徵。他是天生的民衆領袖。長期抵抗的戰爭一開始，他就是我們的 Gambetta。他的政治前途恐須靠與民衆接近。這或者就是在洛陽民意機關所以能產生的原故。

日本人如何取得鐵礦砂的供給

翁文灝

大家知道鋼鐵在近代工業中是如何的重要，所以豐富的鐵礦幾乎是近代國家富強的一個最重要條件。假使有一國如日本努力求他的工業和軍事上發展，而天生的資源中偏缺乏最要緊的鐵礦，他們將如何彌補這個缺憾呢。看他們如何用人力戰勝這個天然的困難，我們就可想見人家做事是如何的努力。

據地質調查的結果日本本國所有的鐵礦砂儲藏量總算起來不過六千萬噸。中國鐵礦雖說不多，但即就交通較便的地方計算也可有九萬萬餘噸（連東三省在內）。所以中國鐵礦至少要比日本多十五倍以上。但是照現在的鋼鐵業看來，除了遼寧幾處日本人經營的鐵廠之外中國新式煉鐵廠出產的生鐵每年不過一萬噸，鍊鋼爐都停了，連一噸也不產。日本的鋼鐵業却是非常的發達。每年要出生鐵一百

七十多萬噸，鋼件二百萬噸以上。他的鋼料自用有餘，還可行銷遠東各地與歐美出品相競爭。日本的化鐵爐每年要用礦砂三百萬噸，如果專用本國的礦砂來煉鐵，他的全國儲量不到二十年就要完了。所以他們對於本國礦砂用的非常節省，不願輕易開採，現在所開採的每年不到二十萬噸。其餘百分之七十的鐵砂需要額都向他處設法取得供給。如何能達此目的當然是狠不容易的事。

日本所用鐵砂的來源第一便是中國的長江流域。在一八九〇年的前後中日兩國幾乎同時開始西法鋼鐵業的經營，中國方面創辦漢陽鐵廠，日本也在門司西面的八幡設立最大的國營鐵廠。日本國營鐵廠設于八幡的理由在於靠近九州筑後煤田，易得焦煤的供給。但對於鐵砂的供給他們實在毫無把握，所以聽到了湖北大冶鐵礦的豐富他們便立

刻要收爲己有。恰好中國辦理漢陽鋼鐵因缺乏經驗屢次失敗資本不足，於是便進行售砂的交涉。一八九九年大冶鐵礦與八幡鐵廠第一次訂立售砂的合同，一九〇〇年八幡纔得開爐出鐵。可見日本最大的八幡鐵廠的鐵砂供給自始即靠大冶鐵礦爲唯一重要的來源。這種關係中國當時似乎不狠知道，一批一批的只管售砂作爲一種籌款方法。到了民國元二年中國政府與漢冶萍公司爭先的要向日本借款，結果是訂立借款合同要在四十年內供給日本鐵砂及生鐵，合共等於鐵砂三千萬噸。其實大冶鐵礦爲漢冶萍公司所有的實際不過二千萬噸，所以他們把大冶鐵礦整個的賣盡了，還要倒欠日本鐵砂一千萬噸。

大冶鐵礦儲量的不足日本人也漸漸的明白了，所以他們又想攫取安徽省內的鐵礦。但民國三四年間中國政府已覺悟日本壟斷中國鐵礦的野心及保存礦產爲自己發展的重要，所以日本人的進行已不及從前的順利。他們往往利用威迫利誘各種手段以求達到他們的目的。所以雖然經過若干阻力究竟被他們在繁昌當塗二縣買去了不少鐵砂。從民國七年到現在止，安徽鐵砂往日本的也已不下五百萬噸。近幾年來長江流域即湖北安徽二省鐵砂運往日本，每年約計九十餘萬噸，十年便可賣出一千萬噸，六十年便可等於

日本全國鐵礦的儲量了。

但是長江鐵礦儲量亦甚有限，即使中國方面不加限制，也眼見得四五十年便可開完，而況中國已有相當覺悟。所以日本人早就向他方面另打主意，便是朝鮮及中國遼寧省的鐵礦的開發。朝鮮鐵礦砂的產額從以前的每年幾萬噸到民國八年突增至四十餘萬噸，到現在每年五六萬噸，一部份在本地煉，一部份也運往日本。遼寧鐵礦先有中日合辦的本溪湖公司，出產不甚多，到民國四年二十一條要求內便有合辦安山等地鐵礦在內。其實安山鐵礦名爲合辦，鐵廠都是南滿鐵道會社獨辦，所以事實上完全成爲日本人獨佔事業。到現在遼寧省內每年開採鐵砂八十萬噸，都是他們的利益。不過遼寧鐵砂儲量雖然非常豐富，但是成分太低，所以沒法把他運到日本國內去，只好就地設廠煉鐵，把生鐵運出去。至於是否就地煉鋼呢，他們還有許多討論尚未決定。

南滿鐵砂既然就地製煉自成一局，朝鮮鐵礦亦不甚多，此後產額恐亦有減無加，長江鐵礦除已售者外中國又有亡羊補牢留爲自用的趨勢，所以日本的鐵砂供給雖然費盡心機還是覺得不足。於是他們再向各處張羅，居然又爲了相當結果。最重要的是馬來半島鐵礦的取得。其中最大的

是新嘉坡西北柔佛的鐵礦，民國十年就有日本人向本地政府領得礦權，僱用華工大施開採。又有脫崙噶奴邦的鐵礦也于民國十六年由田中政府中人給八幡鐵廠訂立了長期售砂合同。所以自從民國十三年起馬來鐵砂向日本進口的逐年增加，到現在每年已有一百萬噸左右，已在長江鐵砂之上。馬來鐵砂成分甚高頗與長江鐵砂的性質相近，日本既得了那方面重要的供給所以對中國的抵制政策便不怕了。甚至在最近時期還有中國人要售砂他偏不願收買的神氣。因為中國老的鐵廠都停閉了，新的還沒有辦成，所以開鐵礦的人有砂無處賣，原來是專靠日本人做主顧的，現在日本却並不在乎此了，豈不可歎！

日本以一個鐵礦儲量最富的國家竟能發展遠東最大的鋼鐵業，實在狠虧他們的經營。即如遼寧安山一帶鐵礦有許多西洋技師還說成分太低不能化煉，日本人却努力研究居然大規模出鐵了，雖然經濟上成功或失敗還待細考，但

中國的包工制

我們的勞工，比從前覺悟了：他們現在大多數有了工會的組織，能用團體的力量要求增加他們的工資，改良他們的待遇。近幾年來，能工的事各處發生了不少。不但資

已見得他們做事的魄力。中國鐵礦照面積人口比例看來也不算甚多，而且煉焦煙煤與鐵礦大抵距離甚遠。交通上更有許多困難，但是與日本比較起來總還是中國礦產多些。然而光緒中葉中日兩國同時發起的鋼鐵業——漢陽鐵廠與八幡鐵廠——何以則一煙消灰滅，一則產量擴充到每天三千噸之多巍然為遠東鋼鐵業的巨擘呢？在民國十年以前日本人正努力取得遠東各處鐵礦之時候，英美政府或資本家似乎還有要想設法與他競爭的意思，所以美國曾經派人到中國調查了一次，英國也曾想在遠東經營鋼鐵業。但是距離太遠了，英美的若干計畫都沒有實現，現在似乎都已甘拜下風了。斐律賓鐵礦甚多，但他們沒有自己化煉的計畫，還存售砂與日本的希望。澳洲似乎最多只能自給。印度賣鐵買鋼，英國鋼料已在那裏感覺日本出品的競爭。俄國也似乎感覺煤鐵遠離交通不便的困難。

漠然

本家方面着了急，就是社會裡一般的人對於勞工的境遇，對於他們的心理及行動，亦發生了相當的注意。但是有一個極大的問題，在勞資兩方，都沒有研究；社會一般的人

，更沒有討論。這個問題，就是各處通行的包工制。

包工制是什麼呢？就是資本方面不與工人直接發生關係；將所有工作，包給第三者；由第三者，即包工者，僱人辦理。只要工作的結果合格，資方就照原來與包工者議定的價目付錢。對於工作需用的人數，工人實得的工資，全都不管。工人方面，只要得到包工者許給他們每人的錢，亦就滿意：資方到底給了多少錢，與他們所得的相差多少，他們一概不問。

在現時勞工覺悟的期間，大家最反對的是「不勞而獲」。凡所作的事，不應社會有用的需要，不是生產程序中所必需而獲得利益的，都是不勞而獲。資本是一種儲蓄的勞力，又是墊付工價及原料機器價值的必需品，在生產程序中是不可少的。勞工不必說，自然是生產的要素了。但是包工的既不供給資本，又不自己勞力。因為資方的懶惰，勞方的知識簡單，就得了極大的利益。即使在生產上有些微的帮助，他們所得的利益，遠過于他們在生產上所盡的責任。所以我們社會裏的包工者，都是不勞而獲的人，包工制是不勞而獲的制度。

我現在將我最近二年以內調查所得的事實，寫些出來，証明我以上所說的話。

上海有一某公司，每年在上海一處所銷的貨物，有八十萬噸左右。他們的貨物，用輪船裝到了上海，有起船，上棧，出棧，過駁等各樣的工作。公司照合同付給包工的工資如下：

起船	每噸銀九分
上棧	二錢五分
出棧	二錢一分
過駁	二錢

但是工人所得的，究竟是多少呢？

(甲)起船 這件工作，就是將貨物從船內起出，放在船面上。所用工人，共有三種：一種是在船底將貨物裝在竹籬裏，預備起重機將竹籬提放在船面上的；一種是將岸上空籬檢齊，送還船裏的；一種是管起重機的鈎子的。裝這項貨物的輪船，載重每隻都在五千八百噸左右。需用起船的工人，是每船裝籬的至多十人（至少八人），檢籬的一人，司鈎的二人。全船四船，需用裝籬的四十人，檢籬的四人，司鈎的八人。工作的速率，每日九小時，可起一千五百噸。

包工的付給工人的工資，是按每天九小時的工作。裝籬的及檢籬的，每人制錢二千二百文，司鈎的每人大

洋一元。照去年四月二日上海的銀市，每制錢三千六百八十五文，合銀一兩的計算，裝籬同檢籬的每人每日九小時的工作，可得銀子六錢，司鈎的每人每日九小時，可得銀七錢二分。

三種工人合在一起，每噸所得的報酬是多少呢？

裝籬工人，每日九小時，每人可裝十七噸半。照每日六錢的工資計算，裝籬工人實得酬報，是每噸合銀一分六厘。司鈎及檢籬的，合在一起，每噸合銀五厘四毫。三種工人合在一起，每噸共得銀子二分一厘四毫。包工獲利每噸六分八厘六毫！

全船照五千八百噸計算，公司付給包工的五百二十二兩，工人實得一百廿四兩一錢二分！如公司所出的錢全給工人，每人每日九小時的工作，平均應得二兩五錢八分。

(乙)上棧 就是將貨物從船面抬到棧內。工作的方法，是二人用一槓棒，抬了裝滿貨物的竹籬，從船面經過跳板，走入棧內，將貨物倒在貨堆上。需用的人數，視起船時所用鈎子而定。起船用一個鈎子，上棧就須有十二或十三根槓棒。起船用兩個鈎子，上棧就須用廿五根槓棒。照全船用八個鈎子，一天起貨一千五百噸

的標準，上棧須有一百根槓棒，每根槓棒，一天九小時，可抬十五噸。

包工的付給槓夫，每槓二人，每日九小時，官價五千二百制錢，實付八折，四千一百六十文。即每日每槓二人得銀一兩一錢三分，每噸工人實得七分五釐。公司付給包工的錢，每噸二錢五分。

每船包工的得一千四百五十兩，工人實得四百卅五兩！若是公司所出的錢，全給工人，每槓二人每日應得三兩七錢五分，每人每日應得一兩八錢七分。

(丙)出棧 就是二人用一槓棒，將一竹籬從棧內貨堆，將籬裝滿，抬到岸邊，倒入駁船的工作。公司付給包工的錢每噸二錢一分。包工的付給工人，每噸官價二百六十制錢，實付八折，計二百零八文。折合銀價每噸五分六釐。

因為出棧工作，不是整日不斷的。有駁船來裝貨，才有工作，所以全日工資，不易計算。

(丁)過駁 就是從大船直接將貨物倒入旁靠的駁船。公司給包工的，每噸銀子二錢。包工的付給工人，每噸一百六十制錢，合銀四分一釐。

以上的事實，可列成一表如下：

公司付 每噸價	工人實得 每噸價	百分比例	每工人 日工實得	如無包工 人每日可得
起艙 銀九分	二分一釐四毫	二三·八	六錢	二兩五錢八分
上棧 二錢五分	七分五釐	三〇·〇	五錢五分一釐	一兩八錢七分
出棧 二錢一分	五分六釐	二六·六		
過駁 二錢	四分一釐	二〇·五		

照此表看起來，實際工作的工人，所得甚微。公司所出的工價，從百分之七十至百分之八十，都被包工的得去了。如有人到上海碼頭去看輪船卸貨，就可看見所有的工人，都是穿着破衣，赤着雙足，滿頭灰土，帶着汗不停的工作。過是熱天，更是受苦。包工的却都不在場：只派幾個監工的，在碼頭督促。上海的物價高貴，生活艱難。工

人每日所得，不過三頓粗飯；有家小的，妻女還須到紗廠工作，以補不足。至于包工的，却都是上海的大富翁了。現在談勞工問題的，他們不是說資方剝削勞方，就是說勞方壓迫資方。但是就以上的事實看起來，在包工制度底下的生產事業，是勞資兩方，都受了包工的剝削及壓迫。

廣告價目

尺寸地位	全頁	半頁	四分一	八分一
內前封面	二五元	十三元	七元	四元
外後封面	二五元	十三元	七元	四元
內後封面	二十元	十元	五元	三元

上表價目均以一期計算。連登二期以上九折，五期以上七五折，十期以上六五折，全年五折。